

孙冶方的“三不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卓元

《孙冶方文集》(10 卷本)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是这套文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但做的工作并不太多。我从编辑过程中学习了不少东西,简单谈三点学习体会。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第一个体会,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中包括几代人的艰辛探索,包括像孙冶方、薛暮桥这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不懈地长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理论观点,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后,邓小平等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进一步归纳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道路。

孙冶方实际上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我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胡乔木在 1978 年 10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文章中有一个观点非常重要,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我想胡乔木的文章应该是借鉴吸收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孙冶方从 1956 年起就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64 年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我们学习胡乔木的这篇文章时,都觉得内容非常新鲜,思想非常解放。这篇文章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性会议,会议公报也讲了“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会议公报专门讲价值规律,当然也是包含了孙冶方在内的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的长期研究和探索的。

我们现在讲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上说,就是让价值规律对社会化生产起调节作用。当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机理讲得更加透彻,应该说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提法大大前进了一步。

财经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怎么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

第二个体会,在编辑《孙冶方文集》的过程中,我感到孙冶方写的文章一方面理论性很强,一方面又很实际,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非常好。

比如固定资产折旧要不要上交财政,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实际问题。孙冶方把它提到非常高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提出如果固定资产折旧上交财政,不留给企业来用,连工厂盖厕所都要上报,层层审批,这样根本不可能有企业活力。从这里出发,他进一步提升到究竟国家的大权和企业的小权应该怎么划分。他说在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范围内属于企业的小权,应该由企业来定,在简单再生产之外的属于国家的大权,应该由国家来定。他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谈起,一直可以提升到国家的大权和企业的小权之间的关系,而且提出财经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怎么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他的问题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他的作品理论性很强,实践性也很强。

“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

第三个体会,就是孙冶方奋不顾身地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1963 年 9 月 18 日,孙冶方写了一个关于利润的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当时并不是公开发表的。

孙冶方认为，对企业来说，争取更多的盈利、更多的利润，应该是企业搞得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标志。如果企业的利润率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以上，就是一个好企业；如果在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以下，这个企业就是不好的企业。所以，他要用利润作为综合指标。

当时，有关机构正在酝酿批判经济工作上的“利润挂帅”。作为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我们当时都觉得他写这个东西太危险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们五个人，桂世镛、项启源、何建章、吴敬琏和我，就在经济研究所一起商量：要向孙冶方建议，第一取消这个工作，不要写这个关于利润的报告；如果孙冶方坚持，报告无论如何要降温，不能写得那么明确，不能说利润是综合指标，说利润作为一个考核指标还可以考虑。我们公推了两位——项启源和桂世镛，项启源能言善辩，口才很好，桂世镛是孙冶方最得意的一个年青人，当时是我们经济所党总支青年委员、团总支书记，请他们两个人当面跟孙冶方讲，建议他或者取消，或者降温。但是项启源和桂世镛去了以后，很快就被孙冶方顶回来了。孙冶方说不行，我还是要照写，而且观点不动，也不降温。从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孙冶方对自己认准的观点是非常坚持的。

孙冶方曾宣布“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他这样的治学精神，我认为对科学研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搞科学研究，探索未知，可能会碰到一些错误，但是在你认为是正确的情况下就应该坚持，不要随风倒，这是做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